

第一章 绪论

—

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生活在华夏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这块热土上。辽阔的祖国大地，山河壮丽，形态万千，既有低平坦荡的平原，又有丛山万仞的山地；既有起伏不平的高原、丘陵，又有群山环抱的盆地。祖国地形就像一座气势如虹的大阶梯，由东而西一级一级地升高。古代劳动人民“天倾西北，地陷东南”的传说，就是对我国地形这一显著特征的说法。我国江河纵横，源远流长，大小河川总长度约 43 万公里，仅流域面积在 1 00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就有 1 500 多条。我国河川年迳流量约 26 600 亿立方米，约占全世界河川总迳流量的 7.3%。我国共有大小湖泊约 2 万多个，其中天然湖面积在 1 平方公里以上的就有 2 800 多个，总面积达 8 万多平方公里，面积大于 1 000 平方公里的有 13 个。中国山川纵横，地形复杂，气候多样，生态条件相当优越，生物资源非常丰富，有世界上特有的奇花、异草、珍禽、贵兽，被称为“世界果木的宝库”、“世界物种的基因库”。我国共有高等植物 32 000 多种，其中仅木本植物就有 8 000 多种，内含乔木 2 000 多种。有许多植物起源于我国，仅种子植物我国就有 196 个特有属；我国

还保留了一些被誉为“活化石”的物种，许多物种为我国独有、独存或主要分布在我国。我国领土只占世界陆地面积的6.5%，但我国所产的陆生脊椎动物约有2000多种，占世界同类动物种数的10%以上；兽类420种（其中哺乳动物占世界兽类总数的11%多）；鸟类1166种（占世界总数的15.3%）；两栖爬行类动物510种（占世界总数的8%）。

人类是由大森林里走出来的，是山林这个绿色摇篮孕育并滋养了我们的祖先，使这万物之灵逐渐成为会劳动、会歌唱、会思想的鲜活生命。“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人类从来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离开了山林，流水便会失去源泉，生命也就失去了血脉，人类就没有生存的基础和条件。绿是生命之源，是灵性之根，是文明之母。有了绿色，才有了草木之华，才有了峰岭之峻，才有了江河之碧，才有了楼栏之美。是绿色孕育了生命，孕育了人类的文明。绿色是大自然的永恒，是人类健康和生命的保护神，是社会文明的标志，是和平和安宁的象征。青山绿水已经凝固成《辞典》中的一种意境，多少文人墨客在其中找到了功成名就的灵感，多少风儒雅士庐居其间乐不思归，从中领悟了超凡脱俗的真谛，多少农夫山民躬耕其上怡然自得，靠这广袤的大自然生生不息。先人在依赖、认识和利用、改造山林大自然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山水绿色文化。在儒家看来，大自然山川林木的形象能够表现出与人的高尚品德相类似的特征。这种“人化自然”的哲理必然会导致人们对山水的崇敬，大自然的山水美由于体现着人的内在品德而具有生命的意义，人们不仅对山水的形体、色彩、音响等作纯形式美的观赏，而且更注重其社会文化的内涵。大自然山水不是远离生活的外在背景，更非与人类对峙的客体，而是交织于

生活之中，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即把“高山流水”具体地比拟为人品高洁的象征，“山水”一词也就成了大自然风景的代称。人们在认识山水中，不仅体验到山水的自然之美，而且从中悟出了深厚的哲理和人生价值。

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论语·雍也》）“涓涓不壅，终为江河。”（《孔子家语·观周》）“不观高崖，何以知颠坠之患？不临深渊，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观巨海，何以知风波之患？”（《孔子家语·困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

孟子曰：“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观山有术，必观其澜”；“观于海者难为水。”（《孟子·尽心上》）

老子说：“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老子》七十六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德经》第八章）

庄子说：“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庄子·达生》）“丘山积卑而为高，江河合水而为大。”（《庄子·则阳》）

管子说：“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管子·形势解》）

荀子说：“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荀子·劝学》）

《列子·汤问》中记载：伯牙弹琴，弹到描写高山的曲调时，在旁听琴的钟子期就说：“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弹到描写流水的曲调时，钟子期就说：“善哉！洋洋兮若江河！”钟子期死后，伯牙不再弹琴，他认为没有人比钟子期更懂得他的音

乐。《高山流水》的乐曲，被后人推为十大名曲之首。

秦国丞相李斯，以一篇《谏逐客书》，雄辩地论证了“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的虚怀若谷、广招贤士才有利于富国强民的道理，遂成了战国时代各国争相仿效的楷模，成了那一时代的指导思想。

《淮南子·说林训》中说：“太山之高，背而弗见；秋毫之末，视之可察。”

汉代刘向在《说苑·谈丛》中说：“高山之颠无美木，伤于多阳也；大树之下无美草，伤于多阴也。”

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在《严先生祠堂记》中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南宋文天祥在《正气歌》中说：“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唐代刘禹锡说出了一种深刻哲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刘禹锡《陋室铭》）“勿药有喜，如山永安。”（刘禹锡《苏州贺皇帝疾愈表》）

唐代魏征说：“地洼下，水流之；人谦下，德归之。”（魏征《群书治要·老子》）

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指出：“文尊韩，诗尊杜：犹登泰山者必上泰山，泛水者必朝东海也。然使空抱东海、泰山，而此外不知有天台、武夷之奇，潇湘、镜湖之胜，则亦泰山之一樵夫，海船上之舵工而已矣，学者当以博览为工。”（《袁枚全集》第3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页）

清代黄遵宪极言山水无价，他说：“寸寸山河寸寸金”（黄遵宪《赠梁任父同年》）。

历史有多少名流骚客钟情于山水，他们尽心尽力建树于古代中国山水绿色文化。“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人名山游。”（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青山爱我，我爱青山。”（元·张可久《殿前欢·爱山亭上》）“少无适俗韵，性本爱山丘。”（晋·陶潜《归田园居五首》）“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宋·欧阳修《醉翁亭记》）“山居者知山，林居者知林，耕者知原，渔者知泽。安于其所而已，其乐不相及也。”（宋·苏辙《超然台赋叙》）“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水能性澹为吾友，竹解心虚即我师。”（唐·白居易《池上竹》）“青山不老，绿水长存”（《三国演义》第六十回）“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宋·李清照《上枢密韩肖胄诗》）

1936年2月，一代伟人毛泽东写了一首《沁园春·雪》的词：“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首出自一代伟人大手笔的词，意境高妙，气派雄浑。它结合长城、黄河、秦晋高原来写，大气包举、景象雄伟，热情地歌颂了祖国的壮丽山河。

古人云：“山因水而活”，“山，骨于石，褥王林，灵于水”，高山流水一向被视为人的高尚品德的象征，因而更增益了山岳风景的灵气。山间水源来自泉眼，也来自渗出的地下水。

和雨水的汇聚。此三者都要依靠森林的涵养，森林被毁，则水源失去涵养而有枯竭之虞。水体一旦枯竭，则植物难于生长，动物难于生存，人得不到饮用水而失却居住的基本条件。由此可见，山、水、绿色植物、动物、人，构成了一个紧密相依的自然整体，山水和森林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母体，绿色是生命的本质象征。

二

文化，是人类社会非常重要的现象。广义的文化概念，即所谓的大文化，是指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类。物质文化是通过物质活动及其成果来体现的人类文化，精神文化是通过人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来体现的人类文化。我们通常所称的“文化”，大致是指这种精神文化，它又大致包括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两个主要部分。

现在通用的“文化”一词，是近代通过日文转译从西方引进的。而西方的所谓“文化”，原从拉丁文“*Cultura*”转化而来，本义为耕种、居住、练习、留心或注意、拜神等。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学者泰勒，在他 1871 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把文化定义为“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

我们所说的中国古代山水绿色文化，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山水绿色文化，是指人类在依赖、认识、

利用和改造山水与大自然环境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在与山水动植物发生关系交流与沟通中产生的美感和愉悦，它主要特指精神财富，如山水文学、艺术、绘画及园林建筑等。中国古代山水绿色文化博大精深，内容非常丰富，它包括人们对山、水和生态环境逐渐深化的认识，山水绿色文化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反映和影响，各个历史时期的有关山水绿色文化的文学艺术作品，以及人们在山水绿色文化建设中的精神追求和获得的精神享受等。

研究中国古代山水绿色文化，首先必须对中国的山和水以及古代绿色事业——林业的基本情况进行深入了解。基本概况在握，方能入门探究。对此，本书尽可能地搜集资料，利用两章的篇幅，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山水和古代林业概况。

第二，研究中国古代山水绿色文化，应该把它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格局中进行，弄清它产生的成因，充分认识“天人合一”观念对山水绿色文化的影响。

在人类社会初期，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威力和千变万化无法理解，对自然事物既有所依赖又有所恐惧，以为宇宙万物都和人一样有自己的意志，都有神在主宰，于是就产生了崇拜行为，形成了原始信仰。原始崇拜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自然的崇拜，另一类是对鬼魂的崇拜，而最早出现的是对自然的崇拜。中国古代崇拜的自然神有天体神、自然力神和灵物天体，崇拜的主要对象是日月，其中又以日神为甚，所以中国原始神话以太阳为中心的故事见多，如羲和生日、羲和浴日、羲和驭日、羿射九日、夸父追日等。民间有“天狗吃月”的传说和鸣锣救月的仪式，秦汉以来嫦娥奔月的故事广泛传播。天体崇拜的对象还有星辰，主要有北斗、太白、岁星、荧惑等。自

然力的崇拜主要有风、雨、雷。灵物的崇拜，首先表现为对社稷神的敬畏。社是社神，即土地神，稷是稷神，代表农神。社稷通常作为国家的代称。土地养育万物，对土地的崇拜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土地对于原始人来说，是灵物之尤，它可以生长出各种供人们生活食用的东西。灵物崇拜，还包括对河神、海神、山神、湖神等的崇拜。在古代灵物崇拜中，对动植物的崇拜比较晚，图腾崇拜即由此而来。中国古代还认为世间万物均有灵魂，动植物到一定时期也会成精作怪，如蛇精、树怪等，这也是鬼魂崇拜的另一种反映，其中带有灵物崇拜的因素。由此可见，山水绿色文化起源于原始宗教中的山水崇拜，山水和动植物崇拜是山水绿色文化之所以产生的最早成因。

早在周代，已出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普遍和谐”的观念。“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基调思想。《易传·乾卦》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十三经注疏》）道出了天人合一思想的主旨。“天人合一”说强调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息息相通，和谐统一。当时阐发此说的主要有孟子和庄子等。“天人合一”思想认为，人是天地生成的，人的生活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人类道德的最高原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因此，人生的理想和社会的运作应该做到人与大自然的谐调，保持两者之间的亲和关系，力求天时、地利、人和的统一。既要利用大自然的各种资源使其造福于人类，又要尊重大自然，保护大自然，维护生态平衡，使其“范

围天地之化而不过 曲成万物而不移（《易·大传》）“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及于人们对山水的认识，体现着人对大自然的一定程度的精神改造。相应地大自然的气质也对人性有所潜移默化，不仅渗透进人们的心胸，而且在那里积淀下来，浸润而成为民族心理、习尚，成为性格禀赋乃至思想感情。这种思想感情又赋予人们的山水观以新的内容，除了宗教性的崇拜之外，还包含着对待山水的一种世俗性的尊重、亲和的态度以及相应的行为规范，如维护山水的自然生态，保护植被、动物等等。所以说，“天人合一”思想不仅是形成山水绿色文化概念的一个积极因素，而且对山水绿色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始终起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天人合一”的和谐观，远非只有国人认识到它的重要性。现代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营垒，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中国如果不能取代西方人类的主导，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著名的“耗散结构理论”创立者、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普里高津教授曾讲到，他的成就很大程度得益于中国哲学的整体辩证及系统存在的和谐统一思想。

第三，研究中国古代山水绿色文化，必须重视传统宗教（特别是佛教和道教）对它的积极影响和强大的推动作用。

纵观中国历史，古代山水绿色文化在建设和发展中，与佛教和道教的传播紧密相连。佛教名山和道教名山的开创和建设，为山水绿色文化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起了积极的推动促进作用。

佛教发源于印度次大陆，在世界三大宗教中，佛教比基督

教和伊斯兰教更为古老，至今已有 2 500 多年历史了。佛教传入中国，一般均认为在东汉永平二年（公元 59 年），相传明帝刘庄夜梦有金人从西方飞来，身有白光。早朝时问朝臣，傅毅回答说，闻西方有大神曰佛，想即是也。于是命蔡愔往西域求之，在大月氏得到一些佛经，以两匹白马驮之而归。明帝命在洛阳建白马寺以藏之。白马寺是中国最早的佛寺。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帝王的提倡和重视，佛教在我国得到广泛传播。慧远（公元 334 ~ 416 年）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有影响的僧徒，他幼而好学，13 岁就随舅父游学洛阳，习儒书和比丘法，不但精于佛学，在儒学上也有极深的造诣。他谈空说有，为佛教的中国化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当时庐山地方清静幽邃，名僧多住在那里，四方清信之士也多望风云集，他们 123 人于公元 402 年由慧远领导结成白莲社，在无量寿佛像前立誓愿往生净土，在东土首创净土法门。隋唐是中国佛教的全盛时代。自魏晋以来，中国佛教只有学派没有宗派，隋唐之际，佛门讲究衣钵的传承，宗派才得以确立。当时有所谓八大宗派，即三论宗、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密宗、禅宗、净土宗。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过程中，曾遭遇所谓“三武一宗”的“灭法”事件。三武（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帝）一宗（五代周世宗），“三武”都是要从根本上摧毁佛教，“一宗”的措施带有整顿的性质。“三武”灭佛，又以唐武宗会昌三年到五年（公元 842 - 845 年）的这一次最为有力，计拆除寺庙 4 万余所，没收土地数千万公顷，有 15 万奴婢改为两税户。唐武宗灭佛后，佛教各派日趋没落，只有禅宗、净土盛行不衰。佛教徒一向有寻师求法的传统，中国从禅宗兴起后，禅僧更常远离乡曲，脚行天下，所以称“行脚僧”。行脚僧行踪不定，犹如

行云流水，所以又称“游云僧”和“云水僧”。到了南宋宁宗年间，行脚僧集中朝拜的地方，有“五山十刹”的规定。明代以降，佛教徒又出现了参拜名山的风气，而有金五台、银普陀、铜峨嵋、铁九华之说。佛教对中国山水绿色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晋宋之际，空宗一切皆空的思潮，在诗坛上开辟了优游自得、寂静恬适的新诗境。当时的山水诗，就以这种诗境享誉于后世。唐代禅宗兴起，诗人们以禅入诗，被称为“诗佛”的王维，他的《鹿柴》诗，就是依据禅宗“返照”、“空寂”的义理，通过描绘鹿柴深林中傍晚的景色，表现寂灭无常的心境。佛典直接为中国古代小说创作提供故事来源，启发艺术构思，对六朝志怪小说和明代《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的产生和繁荣，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大约产生于东汉巾叶。道教大概有三个来源：一是源远流长的民间巫术，二是黄老清静无为之学，三是《周易》的别派。早期道教有汉末的五斗米道和太平道。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道德经》为主要经典。东晋葛洪（283~363年）系统总结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理论，建立了一套修炼成仙的方法体系，提出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的主张，将道教的神仙方术和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为上层化的官方道教奠定了理论基础。南北朝时期，嵩山道士寇谦之（365~448年）、庐山道士陆修静（406~477年），对早期的道教进行改造，使道教的教规、仪范逐步定型。以此前提下，陶弘景（456~536年）继续吸收儒佛两家思想，充实道教的内容，构造道教神仙谱系，叙述道教传授历史，主张三教合流，对后世道教的发展影响极大。从隋唐到北宋，是道教教理不断深化、道教处于鼎盛时

期，唐代视道教为国教，推崇《道德经》，使和儒家的“五经”并立，又封庄子等为真人，改庄子等所著书为真经，规定贡举士子必须兼通道经。南宋以降，道教继续处于鼎盛时期，但内部宗派纷起，互争教会的领导权。在北方，王重阳（1112～1170年）创立了全真道，在整个元代，全真道受到统治者的支持。南方天师道为了和全真道抗衡，和上清、灵宝、净明等符箓派逐渐合流，后来三十八代张天师被授为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于是道教又正式形成正一和全真两大宗派，在明代继续流传。明世宗信奉正一道，他任用正一道的道士担任朝廷重要官职。清代统治者不重视道教，官方道教逐渐衰落。道教有三十六天说和三十六地说，还说八方巨海之中有十洲三岛，为仙人游憩的地方。人间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上帝命君仙治之，多得道之所。得道有肉体飞升，游于名山，先死后蜕等方式。道教崇尚自然环境，我国著名的五岳（泰山、华山、衡山、恒山、嵩山）以及武当山、青城山、龙虎山、齐云山等，都是道教名山。道教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都选自山清水秀、环境幽美的山岳。而这些都无不和山水绿色文化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唐宋，是佛教和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禅宗兴起导致佛教完全汉化，道教也回归老庄、融汇禅学与道家合流，儒家汲取佛、道的精义而发展成为理学。佛禅、道教、理学鼎足而三，代表着中国文化发展的新动向，佛禅和道教的思想已广泛渗透于文人士大夫的意识、趣味和爱好之中。知识界流行谈禅论道，知识分子乐于与僧侣道士交往，许多人甚至成为佛徒、道士，或者亦儒亦佛亦道。禅农并重的经济伦理导致名山寺观经济的“人世”转向，僧道们不仅参与农业生产劳动，还把植树

造林、绿化环境视为一项主要的公益事业，逐渐形成保护山水生态环境的优良传统。许多荒山秃岭经过寺观有计划的公益劳动种植各种树木，而成为绿云蔽天、青翠欲滴、郁郁葱葱的生态环境。这个优良传统一直保持下来并不断发扬光大，对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山水绿色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积极作用。

第四，研究中国古代山水绿色文化，必须正视和客观对待古代“风水术”的文化现象。

天下名山僧占多，灵山秀水墓占多。古人认为，世间万物均有灵魂，山水也有灵性，所谓“人杰地灵”。中国古代“风水术”，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民间广为流行，在长达几千载的发展过程中，它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各种流派，对中国古代建筑尤其是对坟墓和住宅建筑影响极其深远，成了左右人们衣食住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风水”，主要是指古代人们选择房屋建筑和墓葬地点时，对气候、地质、地貌、生态、景观等各建筑环境因素的综合评判，以及建筑营造中的某些技术和种种禁忌的总概括。它起源于人类早期的择地定居，形成于汉晋之际，成熟于唐宋元，明清时日臻完善。风水理论大致分为两个流派：一是形势派，着眼于山川形胜和建筑外部自然环境的选择；二是理气派，注重于建筑方位朝向和布局。而各派又有侧重阳宅（住宅）和阴宅（坟墓）之区分。早期风水术只是以口授心传的方式传播，其后才有刻印书籍流行，而到明清官方编纂的《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类书，均收录了若干风水内容，使风水理论趋向公开化、正规化、合理化。清代时，“风水先生”的社会地位排在“上九流”的第四位，仅次于师爷、医生和画工。

总归中国山脉水系的大概，以及纳阳御寒的气候实利功能，风水学家概括出了一个“风水宝地”的环境模式。这个环境模式是一种理想的背山面水、左右围护的格局：建筑基址背后有座山“来龙”，其北有连绵高山群峰为屏障；左右有低岭岗阜“青龙”、“白虎”环抱围护；前有池塘或河流婉转经过；水前又有远山近丘的朝案对景呼应。基址恰处于这个山水环抱的中央，内有千顷良田，山林葱郁，河水清明。按风水的说法，一家之主坟墓的风水，会影响一家人的命运；一家屋场选址的风水，会影响到主人的事业和家业兴旺衰败。“风水术”的对象直接针对着山水，并且引申出“坟山风景树”、“水口风景树”、“坟山禁伐林”等，因此不能不说它是山水绿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影响极其深刻和广泛的“风水术”加以了解与探讨，于研究中国古代山水绿色文化来说是完全必要的。不过，我们一定要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吸取其中某些科学的成分，剔除其中迷信的东西。

第五，研究中国古代山水绿色文化，必须认真学习和大力挖掘古代山水文学艺术。

中国古代的山水文学艺术，包括山水诗歌、词曲、散文、绘画、园林等，它们构成了中国古代山水绿色文化的骨架和主体。从先秦文学中的古代神话和歌谣、《诗经》、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寓言、《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中，山水文学家群星闪烁，山水文学和山水绘画艺术作品浩如烟海。许多政治家、大文豪和名流骚客，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理想同祖国的壮丽河山紧密结合起来，有的云游名山大川，有的结庐隐居，面对祖国的大好河山尽情吟颂，写出了无数脍炙人口、流芳万代的山水名篇，为发展和繁荣中国古代山水绿

色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山水绿色文化发展进程中，山水文学家灿若星辰。谢灵运被誉为山水诗的开山始祖，陶渊明被誉为田园诗的鼻祖，元结、柳宗元被称为山水游记散文的奠基人和大师，李白、杜甫被誉为诗坛“双子星座”；“三苏”父子和韩愈、柳宗元、王安石、欧阳修、曾巩被称为散文“唐宋八大家”，苏轼、辛弃疾并称为宋词大师，至于山水绘画更是人才辈出，作品浩如烟海。

江山如此多娇。多少文人名流在他们的山水文学作品中，以多彩的健笔，描绘出一幅幅绚丽多姿的山水画卷。“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苏轼《念奴娇》）“花燃山色里，柳卧水声中。”（宋·范成大《清明日狸渡道中》）“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唐·杜甫《绝句四首》）“万顷湖天碧，一星飞鹭白。”（唐·皮日休《秋江晓望》）“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唐·王维《送邢桂州》）“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唐·白居易《暮江吟》）“海曙云浮日，江遥水合天。”（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引唐刘沧句）“天寒远山净，日暮长河急。”（唐·王维《齐州送祖三》）“山临青塞断，江向白云平。”（唐·王维《送严秀才还蜀》）“水国舟中市，山桥树杪行。”（唐·王维《晓行巴峡》）“檣出江中树，波连海上山。”（唐·孟浩然《广陵别薛八》）“云山海上出，人物镜中来。”（李白《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天清远峰出，水落寒沙空。”（李白《岷山怀古》）“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李白《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远峰带雨色，落日遥川光。”（唐·岑参《林卧》）“分明峰头树，倒插秋江底。”（唐·岑参《峨嵋东脚临江听猿怀

二室旧庐》）远山芳草外，流水落花中。（唐·司空曙《题鲜于秋林园》）大江寒见底，匡山青倚天。（唐·白居易《题浔阳楼》）“万丈赤幢潭底日，一条白练峡中天。”（唐·白居易《八峡次巴东》）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宋·辛弃疾《鹧鸪天·送人》）“一天秋色冷晴湾，无数峰峦远近间。闲上山来看野水，忽于水底见青山。”（宋·翁卷《野望》）长江浩浩西来，水面云山，山上楼台。山水相连，楼台相对，天与安排。（元·张养浩《双调折桂令·过金山寺》）水边杨柳绿丝垂，倒影奇峰坠。（元·王恽《越调平湖乐》）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明·高启《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黄河九曲天边落，华岳三峰马上来。”（明·黄滋《送李佑之赴陕西参议》）长白峰高尘漠漠，浑河水落草离离。（明·陈子龙《辽事杂诗》）水流曲曲树重重，树里春山一两峰。（清·郑燮《潍县竹枝词》）水从天上落，路向石中分。（清·张衍懿《瞿塘峡》）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唐·王维《使至塞上》）落日下河源，寒山静秋塞。（唐·王维《奉和圣制送不蒙都护兼鸿胪卿归安西应制》）“春山冶。如笑，夏山苍翠而欲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宋·郭熙《山川训》）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宋·欧阳修《醉翁亭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唐·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秋山野客醉醒时，百尺老松衔半月。”（唐·施肩吾《秋夜山居》）万壑泉声松外去，数行秋色雁边来。（元·萨都刺《梦登高山得诗二首》）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唐·柳宗元《江雪》）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登高》）“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

道月分明。(宋·黄庭坚《登快阁》)闲花满岩谷 瀑水映杉松。啼鸟忽临涧，归云时抱峰。”(唐·王维《韦侍郎山居》)“江流有声 断岸千尺 山高月小 水落石出。(宋·苏轼《后赤壁赋》)“草满池塘水满陂，山衔落日浸寒漪。牧童归去横牛背 短笛无腔信口吹。(宋·雷震《村晚》)八月长江去浪平，片帆一道带风轻。极目不分天水色，南山南是岳阳城。”(唐·崔峒《清江曲内一绝》)“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却有晴。(唐·刘禹锡《竹枝词二首》)独坐幽篁里 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 明月来相照。”(唐·王维《竹里馆》)断霞散彩 残阳倒影 天外云峰 数朵相倚。(宋·柳永《玉山枕》)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宋·张先《天仙子·送春》)……这些山水文学佳句，既是诗，又是画，是景，是情，是美，是音乐，是胸怀，是理想，读后令人感慨不尽，精神振奋，令人对美丽的大自然无限向往，对美丽祖国的热爱之情油然而生。

描绘自然景色的山水画，在汉代画像石中，已具雏形。三国时孙权的赵夫人已是山水名家。东晋时期著名的大画家顾恺之所作的《雪霁望五峰图》，开创了山水画的先声。他的《四时诗》：“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晖，冬岭秀孤松。”形象地表现出大自然在不同季节里的百态千姿。刘宋时期，宗炳之作《画山水序》论画山水的方法，说明山水画在当时已相当成熟。传世的山水画，当以隋代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为早。展子虔作画，能使咫尺画面，备具千里之趣，笔致凝炼，匠心独运。但山水画成为画家的一个宗派，则始于唐朝的李思训和王维。唐代李思训（651~718年）继承展子虔的画风，笔法工细，设色艳丽，有富贵气象，首创金碧青绿山水